

我与艾森豪威尔的爱情

[英] 凯·萨默斯比·摩根著

王云 木宇 方雁 译
花城出版社



47.1168
MKS
c-1

我与艾森豪威尔的爱情

〔英〕凯·萨默斯比·摩根著

王云 木宇 方雁译

我与艾森豪威尔的爱情

〔英〕凯·萨默斯比·摩根 著

王云 木宇 方雁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插图 160,000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册

ISBN 7-5360-0422-2/I·390

定价：3.30元

责任编辑：罗国林

封面设计：王 越

我一直觉得我的大半生就像染发广告中的那位姑娘，她老是问：“她是不是？”对于我而言，人们不是在猜测我头发的颜色。

这件事常常令我十分痛苦。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感情的创伤得到了愈合。终于，“她是不是？”成了奇怪而又过时的推测。假如时光倒流，我又回到而立之年，作为刚毅、迷人的欧洲同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司机、秘书和知己女友，没有人会奇怪地问：“他们是不是？”如今，人们会一下子想到我们是——并赋予更多的现代想像。然后，这一切会被遗忘。

可事情并非如此，它花了数十年时间才使人们淡忘。就在我以为这件事已在人们心目中消失时，它又一次复活了。默尔·米勒在《直言不讳——哈里·杜鲁门的自述》一书中，令人心碎地重提旧事。那是1973年深秋，在该书正式出版以前，有关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我的几段文字，已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新闻！

真难以置信，将军已离开我们4年了，而我除了在特定的距离外，也近30年没有见到他了。我想，那已成了遥远的

过去，可人们并不这么认为。就像劳埃德·希勒在《游行》杂志上所写的那样：“记者开始四处寻找凯·萨默斯比，但没有发现她。”

那是有原因的。当这事儿传开时，我正在手术台上。然而，记者都是些固执的家伙，一位英国人终于找到了我。他查阅了旧剪报，上面提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于是，他打电话给她。

“夫人，”他说，“我是从伦敦给您打电话。当年凯和摩根结婚时，您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是吗？”

那位夫人完全没有戒心。“是的，”她回答，“他们正是在我这套公寓里举行婚礼的。”

“我是凯的老朋友，”他说，“我想和她取得联系，您能告诉我她在哪儿吗？”

这是谎话。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但这一点我的朋友不可能知道，她告诉他：“凯在纽约医院，刚动了外科手术。”

我正是在那里，赤裸裸地躺在特护病房外，一支静脉液滴注管插进我的手臂，另一支插进我的鼻孔。这时，医院的显示灯告诉我，我有一个海外电话，问我是否有力气去接。我没力气，但无论如何要接，因为我断定那是我弟弟谢默斯从8,000英里外的约翰伯打来的。其实，是这位记者先生。

“我从伦敦给您打电话，”他说，“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儿？”

只有动过大手术的人才能体会我当时的状态。麻醉的效果还没完全消失，我昏昏沉沉的，手术带来的恐怖感又使我筋疲力尽，说话要费很大力气。

“什么怎么回事儿？”我虚弱地回答。

“你和艾克的事儿，”他说，“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以为他又是在重弹“他们是不是”这支老调。这帮醉鬼和疯子为了打赌和发泄私愤，深更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已经够讨厌的了，然而更可恶的是竟追踪到医院来打听我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关系。

“无可奉告。”我说着挂断电话。然而，他却有他的报道：“住在纽约市的凯手术后正在康复，她拒绝把他和艾克曾经计划结婚的事透露给记者。”

这已经造成危害。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哪儿，电话、电报从全球的各个角落打到医院来。当然，我很快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了那次电话。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给我带来了那本书，还附带一张书签，上面有杜鲁门总统披露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事。

哈里·杜鲁门不喜欢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已不是秘密，但我却在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国务卿拜访艾森豪威尔将军设在法兰克福的指挥部时就喜欢上他了。那是1945年波茨坦会议期间，三位头面人物在波茨坦讨论重大问题，包括美国的新武器原子弹。（在原子弹被发现前几周，我听到艾克和他的高级官员讨论原子弹爆炸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当时我就想，噢，我该离开这房间了，这是些我不想知道的事。）

会议将近结束时，杜鲁门来到法兰克福检阅第84步兵团（那里有许多来自密苏里的士兵）。那是七月炎热的一天，在回指挥部的路上，我们驱车通过灰尘滚滚的德国乡村，一路谈论着美国大批士兵的情况。杜鲁门总统一进门就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这里很大，让他想起五角大楼。艾森豪威尔告诉他这里曾是巨大的G.I.法尔本综合工业中心。

当总统和将军结束谈话时，艾克把我叫进去，并介绍给总统。我想，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非常友好、坦率和自然。

在我的办公日记里，经常草草记下一些私事，诸如将军的约会等等。那天，我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艾克离开办公室去会见总统……没想到2点30分艾克将总统和国务卿伯恩斯带到办公室来了。艾克告诉总统我想成为美国公民。

那天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谈话后的三个月，我便飞往华盛顿去办理加入美国籍的第一张证件。

如今28年过去了，我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篇难以置信的报道。杜鲁门总统告诉他的传记作者默尔·米勒：“战争刚刚结束，他（艾森豪威尔）就写一封信给马歇尔将军，说他想回美国与艾森豪威尔夫人办离婚手续，以便与那位英格兰女人结婚。”

他的要求遭到粗暴的拒绝。甚至连坦率的杜鲁门总统也像被这严厉的拒绝震惊了。

“马歇尔给他回了一封信，”总统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信。他说如果他……如果艾森豪威尔胆敢做这样的事，他不但会将他剔除出军队，而且一定让他的后半生永无安宁之日……如果他再提这种事，他一定会使他的后半生像活在地狱里一样。”

然后杜鲁门总统说：“作为一个总统，我最后干的一件事，就是从五角大楼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些信件并将它们销毁。”

我只想静静地躺在医院那张简朴的小病床上，与世隔绝，以便有闲暇回忆我和艾克之间遥远的过去。这几段文字很令我吃惊，我需要理顺自己的感情。

然而，这种安宁却不可得。虽然医院不再把电话接进我的病房，但仍然不可能摆脱记者，他们都非常固执。我第一次走到大厅——自己走十步到洗澡间，回来由护士搀扶着——回来时发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坐在我的床脚。我想她准是我哪位朋友的女儿，如今已长大成人，我认不出来了。一问才知道她是《费城问询报》的记者。她自己进入我的病房并一屁股坐下来，我对此很不满。

“你怎能这样子进来？”我问道，“我动了大手术，觉得很不舒服。”事实上，这一天正是病情确诊的日子。没错，那是癌，肝癌。没有，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听懂了医生对我说的话，感到心烦意乱，但并没有真正明白它的意思。一直过了好几个礼拜，我才明白过来。尽管如此，在那些日子里，我仍无法战胜自己的感情，更不用说去应付记者了。

“我相信你的编辑不会赞成你正在做的事。”我说。她仍坐着不动。

“请你离开好吗？要不要我请人来撵你？”我问道。

于是，记者站起来。“你什么也不愿说吗？”她问道。

连“再见”我也不愿说，说不出。我把脸转到一边，由于虚弱和受挫而浑身发抖，双脚冰冷，前额沁出汗珠。

此外，还有上打的记者闯到医院来。“无可奉告。”我说。于是，他们走了。护士因此而取笑我，“张开你的嘴，”其中一个常常对我说，“到吃药时间了。”我刚有一点儿力气，就不管医生紧张不安的抗议，逃离医院，住进允许我匿

名的朋友家里，那里很安宁。

至于档案，我发誓我不知道将军曾经写这样一封信给马歇尔将军，完全不知道，在人们认为他写的年代不知道，后来同样不知道。

我饶有兴趣地阅读陆军少将哈里·沃恩（他曾经是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助手）对记者说的话。他说，早在1952年就有关于那些信件的谣传。“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他说，“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和艾森豪威尔正在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互相耍手腕时，塔夫脱手下的人就听到艾克写给马歇尔的那些信，想复印。杜鲁门听说后，命令五角大楼将信件送至他处。他不想让塔夫脱的支持者将这些信件在全国散播。但我不相信他销毁了这些信件。我想他将它们送回给了马歇尔将军，并在里头留张纸条：‘这些属于你的个人的档案，我不想它们被用来为肮脏的政治目的服务。’”

我不曾听到1952年的那些谣传。

后来，有人曾提示过那些信件的存在，但我不相信。

几年前，大概是4—5年前，大卫·萨斯坎德打电话给我：“凯，我想请你上电视。”

“噢，太好了！”我说，“你想让我在荧屏上说什么呢？”

“当然是有关信件的事。”大卫说。

“什么信？”我问，确实很糊涂，“我对你所说的一无所知。”

他却说：“噢，来吧，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艾森豪威尔的信，艾克写给马歇尔将军说他想和夫人离婚并同你结婚的那封信。”

我一时懵了。然而，我想，那不过是胡说八道，大卫只

是试图为他的节目挖掘一些引起轰动的素材罢了。

“大卫，”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某些人给你编造了一个谣言。我不上你的节目了，没什么好处，我没什么可说的。”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净，那以后，再也没听到有关信件的任何议论。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又突然谣言四起。那已经是1973年，当时我躺在医院里，连我自己都无从知道艾克是否真的写了这样一封信，但我相信哈里·杜鲁门的诚实，不相信他会无中生有，也不相信哈里·沃恩会凭空捏造。

我承认我全身心地希望艾克写了信给马歇尔将军，我相信他写了，也正是这种信念鼓起我的勇气，使我有力量写这本书。

这些信件被披露出来后，公众的反应使我大吃一惊。谁能相信一个爱尔兰女人（我出生在科克郡，并不是杜鲁门总统所说的那样是一位“英格兰妇女”）和一个美国将军的关系在三十几年后仍能引起各方人士的兴趣？何况，我们这种关系始于35年前，并在3年后便突然中断了。我想这件事之所以至今人们记忆犹新，是由于艾克不仅仅是战时的英雄和美国的两届总统，而且首先是一个赢得美国人民的心，乃至世界人民的心的男人。他同时也赢得了我的心！

对此事感兴趣的人们，下面就是将军和他的爱尔兰司机的故事。如今，我能自由自在地谈论它了。将军已逝去，我也在走向死亡。1948年我写《我的上司——艾森豪威尔》一书时，略去了许多事实，改写了一些细节，尽量掩饰我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较为妥当的方法。当海军上校

哈里·布彻写《我和艾森豪威尔相处三年》时，也为了同样的原因这么做了。布彻只是附带提到我，经常简单地称我为“司机”。我们俩坚决为将军的私生活保守秘密。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任何能够被看作将军名誉上的污点的事情，都可以利用作为政治武器。然而，时代不同了，我相信今天不会有人将我们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不道德的，当然也就不会有损将军的声誉。我坚信道出真相总比回避历史要高明。也许，终有一天，事实的真相会成为历史的一个小小的脚注。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我请求读者宽恕，由于我的故事来自我的记忆，来自我那本旧蓝皮日记——我的心，所以如果偶然出现时间顺序颠倒或事实有出入，那只是因为年龄对记忆的捉弄，并非本人有意。书中的对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在我心中回荡，但应该明白，它们都是我记忆的重新组合。我正在写的故事对于我来说意味深长，然而，在漫漫的长夜里，我将它们留给了自己，以致我想我的故事是如此逼真，就像是在昨夜我才向将军，向艾克，向我心爱的男人说再见一样。

2

每个重大事件的发生，人们是不会预先知道的，而当它发生了，往往还要过相当长时间人们才意识到。我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相遇也正是这样。当时，他是陆军少将艾森豪威尔，只有两颗星，且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那时候，我是英国汽车运输队成员。那是战时组织起来的女演员志愿队。我认识里头的很多人，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舞会，一起在赫林翰观看水球，一起在苏格兰度过周末。但我和她们不同，她们大部分人是很富有的，而我不是。

我的丈夫戈登·萨默斯比是一位年轻的出版商。我们最近才分手。为了维持生活，我给巴黎的沃思高级时装店做模特儿。沃思领导着女时装业的潮流，体现了有钱的女演员和遗孀们穿着的精华，那里的服装用料优质，款式考究，不夸张做作。时装店里挂着一张半世纪前的女人肖像画。这位美貌的年轻女郎穿着沃思设计的舞会礼服。我常常在夜间穿着沃思的新款礼服出入伦敦的大型舞会（这是最好的广告，店里的女老板常借珠宝给我佩带）。在那里，看见其中一些后来也参加汽车运输队的女孩子穿着我在圣诞节前后曾穿来做模特儿的礼服跳狐步舞。于是，我们互相赞美一番。

如今，沃思的礼服已成为过去。我于1939年9月4日，也就是内维尔·张伯伦首相宣布我们与德国宣战的第二天离开了时装店。当时，首相说：“又要打仗了，真恐怖。”他说得对，战争确实恐怖。确切点儿说，战争给我们当头一棒，虽然我们都意识到它必然来临。世界在一夜之间变了！我姐姐爱维几个礼拜前就加入了汽车运输队，我决定步她后尘。

我被派到一号营区。这支分队驻扎在伦敦东区一间旧校舍里，靠近伦敦船坞。左邻右舍的伦敦佬常嘲笑我们是“上流社会的女孩儿在做战争游戏”。也难怪他们这样说，他们中许多人穷得令人心酸，而我们却穿着漂亮的制服，天天饶舌，几乎没事儿可做。宣战后的头几个月出奇地平静，一些

人称之为假战争。不久挪威和丹麦沦陷，纳粹分子闪电般地穿过荷兰和比利时，把我们的部队直逼到欧洲大陆边缘——敦刻尔克市海边。

那是1940年6月初，这一周过得像梦魇似的，临时凑合的援救舰队从英格兰驻地出发，到敦刻尔克营救出几百万战士。这是奇迹。德国人在岸边轰炸孤立无援的部队，轰炸驱逐舰、部队运输船和满载着父老乡亲匆忙跑回英国的渡船。他们甚至扫射那些勇敢地横渡海峡的游船。几天的工夫，巴黎沦陷了。这不是假战争！

更严重的还在后头。运输队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彻底武装自己。我们的制服很漂亮，除了裙子外，几乎和英国军官的制服一模一样。他们和我们有同样的武装带和别的一切东西。这些东西我们是在一个军供商店买来的，花了很大一笔钱，约达50英镑。在那时这可是一笔令人咋舌的费用。不管怎么说，那是为了我，因为运输队是自愿装备起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连两便士的报酬也得不到。终于，他们答应每周付给我们2英镑10便士，勉强够买茶和长统袜（在黑市买一双丝袜差不多要花8先令）。

当然，当汽车运输队的女士们在英格兰之战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日子来到时，制服已不存在半点麻烦了。在空袭最激烈的时期，德国的轰炸机夜间出击。那时，我的“制服”是由一条旧灯芯绒裤、一件军衣和我弟弟谢默斯的一件毛线衫组成的。我头戴钢盔，肩背防毒面具（里头装着我的口红和连镜小粉盒）准备值勤。好了，关于制服就说这么多。当轰炸开始时，我正驾驶着运输队的救护车在东区码头周围转悠，没人让我们接受检验。

1940年9月初，英格兰之战爆发了。那是在我入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起初是在白天轰击，德国派出上千架飞机在伦敦上空轰炸整座城市。我们的地区受损失最大，那一天有上百人丧生，几千人受伤。

此后，大部分轰炸机都在夜晚出击。当时有一个卑鄙的卖国贼——我们叫他洛德·霍霍——从德国广播，他在电台里单调地重复说：“轰炸即将开始，轰炸即将开始。”那腔调像孩子们喊：“我要告你妈，你屁股要挨揍啦！”然而，他说的总是准确的。有些夜里，整个伦敦在震动，如同把小地毯抖干净那样，从头到尾摇晃和旋转，尤其在圣诞节后的一个晚上，德军投下了好几万颗燃烧弹。整个伦敦像在燃烧一样，天空红彤彤，团团巨大的浓烟飘过上空，犹如地狱里的云雾，12月的泰晤士河水暖得像从消防人员的水龙管里喷出来的一样。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夜晚。在我那个救护队中有一个男人一遍又一遍地说：“希特勒，你不应该这么干。希特勒，你不应该这么干。”我永生不会忘记。

尽管害怕，生活还在继续。我们的救护队到处收拾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伦敦佬们每晚带着孩子、毯子、扑克牌和装着茶的热水壶步履艰难地走进伦敦地铁（他们已成了我们忠实的支持者），在几百尺深的地下耐心等待着轰炸时间过去。伦敦人看上去很可怕，人人都睡眠不足，许多人无家可归。定量配给制保证了每个人有一份食物，但大部分都是含淀粉的食物。我们需要肉、奶油和新鲜水果。每天，当报警器发出幽灵般尖锐刺耳的报警声时，我们就钻进战壕或就地卧倒，这使我们的衣服一天天破旧，但人人都坚持下去，没有惊慌失措。由于物质紧缺，我们必须排队等候食物、报

纸、烟和公共汽车。我们抱怨、恐慌、疲惫、厌倦，但没有人想到要向希特勒投降。

这个时期也是我个人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戈登和我在分开一段时间后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离婚。这并不轻松，我的精神像崩溃了一样。

1941年5月，猛烈的空袭突然停息了。这只是难得的间歇，颇像是在等待着第二只靴子掉下来那样。轰炸一停，我们的汽车运输队就无事可做。我们全围坐在一起，厌倦地闲聊着。一天，我在鸡尾酒会上遇到一位美国陆军上校，我告诉他我们烦得快要发疯，他听后变得特别殷勤。“唔，”他说，“你提醒了我。”如今，我已记不清那位上校的名字了，但至今我仍然感激他。就在这一周内，美国大使馆向汽车运输队借两个熟悉伦敦周围道路的司机。

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但他们的大使馆已充塞了不少特殊观察家，这些人常常忘记自己穿着文明的服装和一直在互相敬礼。一群美国高级军官已不断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周围作指示，有的参观机场，有的视察沿海的防御工事，另外一些人不管白天黑夜都和英军及政府高级首脑泡在一起交换意见。大使馆需要司机开车送这些参观者准时到达他们要去的地方，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伦敦，确切地说是全英国，都在最严格的安全防卫中。街道、公路完全没有路牌，没有任何可以帮助或启发德国伞兵的标志（那时，德国侵略者是很可怕的），夜晚完全没有灯光，在路上行驶的车只允许打前灯，而且必须很微弱，加上伦敦有名的大雾，就不难理解美国人为什么晚上从来无法准时赴约了。白天也好不了多少，不熟悉伦敦的美军司机经

常迷路，吓得那些军衔很高的乘客血压急剧上升。

我很高兴被选去做司机。以前，我不认识几个美国人，但现在，在格罗夫纳广场20号，我被他们团团围住了。我想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我就认识了在伦敦的每一位美国军官。我喜欢他们充满活力、不拘礼节、热情开朗的性格。我的社交生活逐渐美国化，不久又集中在一个美国人身上。他叫理查德·阿诺德，是西点军校毕业的，人长得非常英俊。人家告诉我，他是一个卓越的工程师。

迪克^①是一个“交通员”，频繁往返于伦敦和华盛顿之间，有时在伦敦呆3天便飞往华盛顿，在那里呆5天又回来呆2个礼拜或2天不等。我从来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到或在什么时候离开，但我们俩都知道我们之间一种特殊的关系在继续。几个月后，迪克从华盛顿回来并告诉我他已向妻子提出离婚，她同意了。“等我自由时，凯，”他说，“你是不是愿意……”我甚至没有等他说完就接受了他的求婚。

婚约并没有使事情有多少改变，我们仍然要在不同的地方偷闲一小时或一个夜晚来约会。这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的。在我们自由的那一天，在战争允许的那一天，有朝一日我们会以某种方式结婚。但在此期间，我们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好好地混日子。

不久，美国的局势发展起了变化。珍珠港事件来得很突然，美国终于参战了。当时的气氛紧张得近乎发狂。一个春天，我们的汽车运输组——现在，我们当中有好些人为美国佬开车——奉一群美国将军的命令，处于待命状态。我决心

① 理查德·阿诺德的别称。